

文化治理现代化：探索历程、本质特征与实践进路

彭陈¹, 杜世雄²

(1. 厦门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4; 2.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文化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探索历程历经了创建开拓、初步探索、体系构建、创新发展4个历史阶段。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具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坚持古今融通与厚植文化自信相统一、坚持兼收并蓄与秉持博采众长相统一、坚持树立规范与治理柔性相统一等本质特征。新时代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 要深刻把握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时代要求, 以“三姓”要求为根本、以“三文”根脉为抓手、以“三化”实践为驱动, 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更好地适应和满足时代发展要求和社会进步需求。

[关键词] 文化治理; 文化治理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精神生活; 精神文化需要

[中图分类号] D 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5) 02-0068-08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22]}文化治理是指统治者通过各种观念意识的表达和实施, 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对政治生活参与主体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 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的一种治理机制^[2]。“现代化”作为“文化治理”的修饰语, 文化治理现代化旨在建构现代化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 释放公民个体及群体的文化创造力, 提升公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文化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的题中之义。梳理建党以来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演进进程, 分析其本质特征, 提炼总结新时代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建议和应对思路, 为每一种现代化的模式发展提供思想支持和价值引领。这对新时代把握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和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纵深发展, 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历程

文化治理现代化是指在遵循现代化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 立足国情进而不断提出解决中国文化治理问题的现实进路, 最终推动文化建设质量提升, 提升人民文化幸福感、文化获得感。回望历史长河, 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主要历经了创建开拓、初步探索、体系构建、创新发展4个历史阶段, 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具有差异化的鲜明特征。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会议和重要文件, 全面回顾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和发展演进, 有助于深刻解析重要文献、领会内涵要义与把握实践要旨。

(一) 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创建开拓阶段 (1921—1949)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便开始了对文化治理的初步探索。这一阶段是为我国文化治理

[收稿日期] 2023-10-11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公共文化服务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FJ2023C001);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博士扶持项目“中国式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研究”(FJ2024BF004);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研究”(FJ2024C006)

[作者简介] 彭陈(1993—), 男, 福建厦门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

创设条件、打下基础的重要阶段, 主要任务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一方面, 在目标取向上, 文化治理紧密结合时代发展有序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引领文化治理的主题是文化发展道路的抉择。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 李大钊等早期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从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中凸显出来, 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作为文化治理的关注点和侧重点, 主张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建设新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 在推动方式上, 中国共产党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述、传播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 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富有时代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逐渐形成,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易懂的语言表述、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与旧文化作斗争的同时以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形式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引领文化治理确立了基本价值原则和奠定了基本思想基调。

(二) 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初步探索阶段 (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我国文化治理开辟了新的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我国在进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 也展开了文化领域的除旧布新。从这时起, 中国共产党开始按照革命胜利前夕所作出的计划, 稳步推动我国文化治理的伟大事业。这一时期, 文化政策更为直接地体现在国家层面的意志, 国家层面尝试通过文化建设逐步巩固国家政权, 并将国家意志借助文化载体潜移默化地植入人民日常生活当中。就某种意义而言, 文化的发展和建设逐渐成为党和国家进行思想领导和价值引领的有机载体。在这样的文化政策引导下, 强大的国家权力几乎渗透到了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但这种文化服务方式无法全面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具有“政治化”色彩的文化治理进一步凸显强烈的国家本位色彩, 尽管这一治理模式能够在短时期内发挥强大支配和动员的作用, 但文化受到外部力量的直接性介入的原则并没有变^[3], 无法从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和多元文化需求。

(三) 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体系构建阶段 (1978—2012)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 我国文化治理的时代进程进入加速推动阶段, 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更为体系化、系统化。一方面, 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推进, 我国文化政策中的政治属性逐渐淡化, 并被融入到市场理性当中, 文化治理现代化由此更为全面。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自身的运作规律开始受到重视。“文化也是一个行业, 一个领域, 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4]。另一方面, 我国文化政策的独立属性开始凸显, 文化在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逐步提升, 并逐渐被提升至与经济、政治相并列的地位。邓小平同志提出: “提高文学艺术水平, 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5]。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战略目标, 更进一步巩固了文化治理的现实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2001年,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将发展文化产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进一步深化了文化建设、文化治理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举措。至此, 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创建和实践路径构建逐步完善并且日益成型。

(四) 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发展阶段 (2012年至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文化治理不断向纵深推进, 我国文化治理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开辟了我国文化治理的新阶段和新境界。一方面, 文化治理机制的复杂性、整体性决定了文化治理路径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在治理主体和内容方面,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文化产业发展有了重大突破和新的发展。这一时期, 政府进一步减少了对文化领域的行政干预, 并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和推行公私合作等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文化投资主体日趋多元, 我国文化事业日益昌盛, 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另一方面, 在文化治理方式和手段方面, 完善的文化体制机制是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

家加大了文化立法的步伐。比如,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有了更为坚实的法律保障。在文化领域,通过制度构建与文化氛围的双重保障,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弘扬社会正气,传播正能量,实现国治民安、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

三、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文化向度的重要体现,文化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实践活动。文化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在建设过程中协调党群关系,又需要协调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建设与维护的关系。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是有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之处,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体地位与人民立场相统一、坚持古今融通与厚植文化自信相统一、坚持兼收并蓄与秉持博采众长相统一、坚持树立规范与柔性治理相统一等本质特征。

(一) 治理主体: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与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是引领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朝着光明前景前进的根本保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推进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旨归。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与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确保文化治理目标与方向的正确性,在推动文化治理过程中实现领导力量与主体力量的统一。

一方面,文化治理现代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领导地位有着深刻的体现:(1)遵循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目标。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文化治理始终与其同步,具有逐步强化的基本特征。(2)遵循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始终坚持强有力且受到大众广

泛支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作用。在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布局也发生转变,逐步转向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文化治理现代化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现代治理实质上是“以民众为中心”的善治^[6],文化治理现代化同样如此。“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7]。不同历史时期,文化治理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1)始终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着力点和立足点,致力于推动文化产品、作品的高质量供给,着力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集中力量解决文化企业实力偏弱、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的问题。(2)以大众对文化建设的广泛参与作为文化治理的重要路径。在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推动和解决国家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发展的主要矛盾外,还致力于推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之中。

(二) 治理要素:坚持古今融通与厚植文化自信相统一

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虽然经历磨难,但是都能够绝处逢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为各个时期的中华民族克服磨难提供精神力量,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然而,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崇洋媚外思想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导致文化传承与建设出现一定的困境。而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有序推动纾解了文化传承过程中所面临的冲突和障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强大精神力量。

一方面,文化治理现代化注重以古今融通突破文化发展边界。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创新发展,除了文化本身具有符合生存价值的特征外,还在于国家内部注重文化的发展样态,推动文化治理突破发展的边界。(1)注重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精髓。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科学的价值指引与强大的精神支撑,而这些价值理念和精神支撑的塑造与形成,与一个国

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密切相连,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要以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为重要依据^[8]。因此, 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推动主要就是 from 本国优秀文化的传承中汲取营养, 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 注重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革新精髓。在当前所有的问题中, 文化发展所隐藏的矛盾最为深刻。在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过程中, 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将国家、个体文化价值观、日常行为文化模式进行有机协调, 致力于突破发展与传承的边界, 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国家文化, 以此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

另一方面, 文化治理现代化致力于以文化自信来突破文化发展困境。(1) 注重文化自信建设。“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22-23}。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过程要拨开崇洋媚外思潮的迷雾, 坚定树立中华文化自信, 注重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进行概括和提炼。比如, 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创建开拓阶段, 中国共产党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述、传播马克思主义, 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思想文化素养,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2) 注重文化认同感的建立。文化认同是民族国家确立其存在正当性的重要依据^[9]。新时代文化治理现代化更加注重从思想领域突破文化传承的界限, 以凸显本民族文化的特征, 从中华民族禀赋、特点、精神来阐释民族文化, 推动以文化人格局的形成与塑造, 致力于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三) 治理立场: 坚持兼收并蓄与秉持博采众长相统一

历史和现实表明, 人类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单一国家的奋斗, 而是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共同奋斗的过程。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文化的全球化与“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全球化的力量得以削弱社会以及地理场所的意义^[10]。在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 党和国家更加致力于打破文化治理的国家边界, 突破文化传播的失语状态,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推动中华文化面向市场、面向世界。

一方面, 文化治理现代化注重兼收并蓄、突

破国家边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 并不是借助殖民扩张和对外掠夺, 而是依靠中华文化本身的价值感召力和思想吸引力, 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普遍赞誉, 而它本身也具有博采众长以促进持续发展的优良传统。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 党和国家更加注重于消除文化传播的边界感。(1)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社会。在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注重从自身实践出发去解答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 推动国家话语体系的建设, 改变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不自信, 如“唯洋是从”或片面的“去历史化”等行为。(2) 更加注重推动对外交流。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 积极推动文化交流, 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国际化和全球化, 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有效推动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 并在比较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化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 文化治理现代化注重博采众长, 改变文化传播的失语状态。一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推动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展开。然而, 到目前为止, 整个世界的话语格局依然是以西方话语体系的主导为特征, 中华文化的传播仍然面临着“贫困”和“失语”的困境, 文化治理现代化应致力于改变这一状态。(1) 更加注重话语体系建设。文化治理现代化进程致力于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比如, 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创建开拓阶段,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对外来文化的批判扬弃, 体现了文化治理注重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特征。(2) 推动国际话语传播。不同历史时期, 我国都紧密结合自身国情和实际发展, 提出与时俱进的文化治理举措和方案, 同时秉持着面向世界、走向全球的人类视野和价值关切, 积极探寻世界文明的和谐与互鉴, 力求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四) 治理方式: 坚持树立规范与柔性治理相统一

文化治理现代化包含有“文化治理”以及“现代化”2个过程, 既需要在文化传承的过程

中考考虑现代化的特征,又不能过于强调现代化而忽视了文化遗产的本质。这个过程包含了文化遗产中硬性的部分,也包括了发挥文化魅力柔性的部分,体现了治理方式的规范性与治理过程的潜移默化。

一方面,文化治理现代化凸显了治理的规范性。规范一般是指群体所确立的行为标准,特定的行为标准不仅可以指导和制约行为主体,还可以限制其选择的行动范畴,对于行为主体的行动具有约束性^[11]。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规范的树立逐渐成为主流。(1)文化治理现代化逐渐呈现出规范化的基本特征。通过文化法律的制定、执法和司法体系的完善,文化治理现代化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比如,1954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进行5次修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又如,新时代以来,国家加大了文化立法的步伐,使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了立法支撑。(2)文化治理现代化注重文化柔性治理体系的完善,主要体现为推动无序性或滞后性文化的治理,防止文化治理过程中的规范退化。比如,2015年,中央印发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治理中的规范建设,坚持运用各种因素推动文化的制度保障,整顿规范文化市场秩序。

另一方面,文化治理现代化凸显了柔性治理特征。传统的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情于理,追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的格局,这不仅是一种审美的态度,更是一种行为方式,成为当前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引。(1)文化治理现代化致力于推动以文化人建设。在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重视人文精神,通过文化的滋养和引领来调适各类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稳定。文化治理现代化过程不仅强调行为方式的规范化,也强调通过各种文化形态来达到其教化功能。(2)文化治理现代化也致力于展现文化故事及其蕴含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在不同时期,文化治理过程都凸显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注重以传承来凸显存在,坚持在自身思想积淀和文化遗产基础之上,运用中国特色、民族底

色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基因推动文化治理的进程。比如,新时代文化建设更加强调历史遗产、文化遗迹的保护,强调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存续,致力于推动文化脉络和文化基因的传承。

四、新时代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有效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思考,以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和本质特征为基本依据和现实参照,从而提出新时代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具体举措和实现路径。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文化治理探索经验的总结,也是面向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新要求。继续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应当以“三姓”要求为根本、以“三文”根脉为抓手、以“三化”实践为驱动切实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

(一) 以“三姓”要求为根本,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

要推动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只有坚持“姓中”原则、“姓社”方向和“姓党”底色,才能始终站稳中国立场、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才能持之以恒地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

1. 坚持“姓中”原则不动摇。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决定了各国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时候将呈现出色彩纷呈的道路途径。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种种考验、重重难关,始终坚持从本国文化建设现状出发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文化需求,以多样化的文化供给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进一步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应该始终坚持“姓中”原则,把握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剖析本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当前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势,正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以及社会转型给我国文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牢牢把握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推动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文化治理现代化道路。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继承革命

文化, 还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为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滋养。

2. 坚持“姓社”方向不偏移。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 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 这不仅事关党和国家的事业大局, 更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性, 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也存在显著区别。我国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 也是人民的选择。进一步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 必须坚持“姓社”方向不偏移, 同时要国情出发确立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道路, 依靠人民力量分阶段地推动和落实, 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放弃、不能改变。

3. 坚持“姓党”底色不忘本。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是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领导者和直接推动者, 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保证。通过不断强化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始终保证文化治理现代化正确的前进方向和正确的道路。进一步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 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要时刻洞察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现实生活需要, 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治理的方针政策, 既适时提出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内容和重要举措, 又通过各种载体和多元路径增强文化治理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从中提炼出符合人民思维方式、心理特点和知识水准的思想精华和不竭源泉, 切实将抽象复杂的文化治理转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日常用语和行为模式。

(二) 以“三文”根脉为抓手, 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

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 文化日益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进一步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 必须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昂扬向上的革命文化、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中汲取思想养分, 发挥文化力量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为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

1.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文

化治理现代化的思想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经数千载实践奋斗所凝结而成的思想文化, 彰显着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境界, 蕴含着中华民族深远的精神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价值理念、精神追求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等内容, 为人在世界的自处和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和智慧启迪, 引导人在纷繁世界中找到真正自圆自洽的美好生活方式。为进一步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 要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千年发展的基本精神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12], 这些核心精神要义流淌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成为中华民族的独有文化标识。与此同时, 要充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政在人”的民本思想、“天下大公”的博大胸怀等传统治理智慧运用到现代治理过程之中, 维护世代传承的优良传统。通过深化改革、敢于创新, 结合制度形成的文化底蕴和现实国情, 促使文化治理体系的调整性适应和内生性演化, 构建与时代相匹配的文化治理体系。

2. 昂扬向上的革命文化是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动力。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和形成的文化形态, 其将最严格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有机结合, 以毋庸置疑的缜密逻辑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一方面, 革命文化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于一身, 赋予文化治理丰厚的历史给养与重要借鉴, 能够引领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 发挥革命文化在文化治理现代化中顶层设计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 必须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汲取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尤其是要注重总结、提炼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品格和高尚品质, 能够从社会层面为文化治理现代化凝聚制度共识和思想共识, 形成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最大公约数, 为新时代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夯实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

3. 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当前形态,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反映了现代中国的崛起实践和价值追求,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走向繁荣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人民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达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实践证明,只有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增强人们对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的信心和决心,在坚持党的领导过程中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必须建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多元文化需求,推动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同时,要充分运用好网络阵地,将网络文化建设视为人民美好生活建设的全新领域和前沿阵地。

(三) 以“三化”实践为驱动,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

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将文化作为一种治理的手段与方式,必须要加强制度构建的保障性、治理方式的时代性、交流交往的国际性。

1. 保障文化治理制度化。制度是治理的手段和尺度,制度体系的完备和健全体现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真实水平。文化体制改革是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提升文化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由之路。进一步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必须关注科学技术的迅速更迭、以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向文化领域逐步渗透的现实,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升级调整和文化治理的手段方式积累力量。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13]34}。要以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为使命,铸牢全体人民凝心聚气的思想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制度体系保障。

2. 促成文化治理网络化。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同时还带动了文化产业结构和文化生态结构的变革。现实生活中,我国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呈现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阶层之间都出现了一定的“文

化鸿沟”。一方面,加强文化治理智能化,进一步促进文化事业与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13]34}。加快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尤其要强化线上线下互动结合的云文化场馆的建设,实现文化成果的全民共享、线上线下同享。另一方面,加强文化治理融合化。加快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尤其是以全息投影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为文旅项目汇聚起强大的技术势能,优化资源互通渠道,实现互联互通、开放共享。

3. 加强文化治理国际化。回望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兴衰演进,可以发现,一个文明体的兴盛繁荣总是处于文化开放的状态之中。中华文化历来就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体系,也曾因封闭保守而遭受挫败和打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秉持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迎来了自身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必须深入推动中华文化与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要着力培育并适度引导市场力量,确保市场引导文化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家传播效能^{[13]34}。文化产业的拓展需要充分发挥其市场属性,借助市场规律发挥中国文化产品自有的质量优势和价格优势,抢占国际市场。特别是影视、出版、艺术类的文化产业项目要摆脱以往西方主导下的相对弱势地位,更需要市场上进一步发力,提升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五、结 语

文化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精神层面的体现,既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强大精神支撑,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具有广泛性、时代性、创新性。有效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既要协调好党群关系,又要协调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建设与维护的关系。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不仅可以透过文化建设

使党群关系更加稳定,也可以使中华文化的传承突破建设困境,对外传播突破失语困境,达到高质量的文化治理规范和高效率的文化治理效果。在全方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文化治理现代化作为精神向度的支撑,既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养分,又要从昂扬向上的革命文化补充能量,还要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其中,保障文化治理制度化、网络化、国际化。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 邓纯东.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反思 [J]. 湖湘论坛, 2018, 31 (6): 13-22.
- [3] 张森. 文化治理: 理论演进、西方模式与中国路径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48.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361.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13.
- [6] 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 编译. 善治: 以民众为中心的治理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 127.
- [7]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1.
- [8] 冯刚, 王振. 以文化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意蕴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6): 83-92.
- [9] 赵剑英. 文化认同危机与建构社会基本价值观的紧迫性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 (2): 87-91.
- [10] 戴维·英格利斯. 文化与日常生活 [M]. 周书亚,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0: 151.
- [11] 章前明. 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中的规范概念 [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 (2): 111-117.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41.
- [1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Moderniz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Exploration Proces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Approach

PENG Chen¹, DU Shixiong²

- (1.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24, China;
2. Graduate Institute for Taiw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ts exploration process has gone through four historical stages of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has shown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dhering to the unity of the leadership pos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people, the un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tivation, the unity of eclecticism and the principles of learning from others, and the unity of governance norms and flexibility.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e must deeply grasp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take being Chinese, socialist and under the Party leadership as the foundation, the roots of "three cultur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practic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the driving point, and enable cult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o better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nd the needs of social progress.

Key words: cult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spiritual lif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责任编辑 冯庆福)